



《春秋》经传对世卿阶层史事的历史书写与解释

唐明亮

摘要:有关世卿阶层的史事是《春秋》经传历史书写的主体,但经传对于史料的编纂与解释存在明显差异。《左传》预设了一种对世卿之“世”与“不世”原因的解释,并在历史书写中力图通过史事之间的联系来揭示这种因果关系;《公羊传》则是在构建历史解释时就抛弃了《左传》所提供的史料,转而通过对《春秋》叙述的模糊化解读来构建一组信息因果链,进而提出“世卿,非礼”的历史认识。西汉以后的史家多继承了《公羊传》的历史观,在历史书写的证据选择上,则是通过从《左传》的整体叙述中抽取部分例证来验证《公羊传》“世卿,非礼”的合理性,《左传》、《公羊传》皆以各自预设的历史解释来完成对世卿的书写。这些书写方式上的不同,不仅反映了中国古代经学与史学在历史解释方面的差异性,而且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古代经学与史学在认识论形成路径上的差异提供了一个视角。

关键词:《春秋》;《左传》;《公羊传》;世卿阶层;历史书写;历史解释

DOI: 10.13734/j.cnki.1000-5315.2024.0712

收稿日期:2023-07-13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春秋世卿政权结构演变研究”(20BZS01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唐明亮,男,安徽和县人,历史学博士,南通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先秦史、中外古史比较研究,E-mail: tml1984@163.com。

《春秋》经传历史书写的主体部分,就是对世卿阶层的史事叙述,这一点中外史家基本认同。何怀宏说:“离开了世族,一部春秋史几乎无从说起,而抓住了世族,春秋时代的历史方由纷纭变得分明。”^①日本学者吉本道雅不仅认为“《左传》所记的具体个人,基本是世族。下层大夫与士虽然偶有出现,但原则上被视为匿名的社会集团。至于庶人以下,索性连记载的可能也没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左传》的视点在世族。对下层大夫只是出于对世族的关心才偶有言及”,而且将“世族”界定为“作为宗主的卿及上层大夫”^②。《春秋》经对世卿的记载有简略的事实而无解释,三传对世卿之史事既有记载又有解释,其中尤以《左传》、《公羊传》内容较多,但二传在文字表达上则又各有侧重。《左传》对世卿阶层的史事叙述最为详备,其历史解释则较为隐晦;《公羊传》对世卿相关的史事记载较少,在历史解释上却得出了与《左传》迥异的“讥世卿”的历史观,并对后世关于中国古史的书写产生了深远影响。《公羊传》这种证据与判断相分离而产生的历史观是怎样生发并产生影响的?《左传》、《公羊传》两者认识差异的比较,对于认识中国古代经学、史学两种历史解释又有着怎样的理论意义?为回答以上两个问题,本文以“世卿”为例,略谈个人的看法,敬请方家指正!

一 《左传》:叙述客观性与预设历史解释之间的张力呈现

《左传》关于世卿阶层的叙述最为详备,既记载了春秋社会的时代特征,又阐明了个人对历史的认识。具体来说,主要是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的。

①何怀宏《世袭社会及其解体: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01页。

②吉本道雅《春秋国人考》,徐世虹译,刘俊文主编《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上古秦汉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90页。

(一)“世”的合“礼”性

在周代社会,世袭制显然是合乎礼法的。金文中留有大量“子子孙孙万年永宝用”的记录,可证权力世袭不仅在观念上而且在现实政治中有着很深厚的社会基础。春秋时期贵族的世袭,使得各诸侯国内形成了若干以家族为单位的政治集团。他们拥有雄厚的实力,成为春秋社会治乱兴衰的主导因素。事实上,乱政并不意味着贵族世袭制在春秋社会是非“礼”的;恰恰相反,世卿的世袭守土正是符合周礼的。鲁襄公二十四年,鲁大夫叔孙穆叔对晋卿范宣子说:“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祧,世不绝祀,无国无之。”^①

即便是世卿家族的一代人或几代人与国君存在尖锐的矛盾,但其家族保姓受氏依然作为周礼的一种传统在延续。甚而对于因内乱、弑君被灭族或逃亡的家族,仍然可受再封之赏,而其再封也是直接源于国君的。这些传统在《左传》中多有记载。比如《左传》庄公十六年:“郑伯治与于雍纠之乱者。九月,杀公子闾,别强钜。公父定叔出奔卫。三年而复之,曰:‘不可使共叔无后于郑。’”^②郑国之共叔段、公孙滑、公父定叔三世为乱于郑国,然而郑厉公仍旧复立他为贵族。可见,贵族存亡继绝的传统在春秋社会仍然根深蒂固。这是因为自周初就制定了将政治制度系于血缘关系的强有力措施,如“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大宗维翰,怀德维宁,宗子维城,无俾城坏,无独斯畏”^③等,这样沿袭下来的血缘政治观念在春秋时期一直具有强大的支配作用。

《左传》在记载周代历史传统时,往往也加入个人的评论。其评论中所蕴含的历史解释,是通过两种方式来体现的。一是解读《春秋》书法。如《左传》宣公十一年:“乃复封陈。乡取一人焉以归,谓之夏州。故书曰‘楚子入陈。纳公孙宁、仪行父于陈’,书有礼也。”^④二是直接评论。如《左传》成公十八年:“国弱来奔。王湫奔莱。庆封为大夫,庆佐为司寇。既,齐侯反国弱,使嗣国氏,礼也。”^⑤

可见,《左传》在完成这一历史叙述时,并不是从维护君主地位和政治稳定立场出发来认识贵族世袭制的历史意义,而是就事件所发生的具体历史背景来探讨其存续的原因,反映了春秋时期社会全体对世袭制的认同,并且作者的历史认识也与春秋时人的认识相一致。

(二)“不世”的合“理”性

《左传》在记述周礼的传承时,也注意到了春秋时代的变革。这个变革就是有世卿亡家灭族。既然权力世袭是合乎周礼的,且得到作者的肯定,那么对于忽焉不世之卿,作者又持怎样的态度呢?

以对晋国郤氏的记述为例。郤氏是晋国实力雄厚的世卿,及至灭亡前夕,其家在晋国已立三族,称为“三郤”,势力不可谓不大。而且,郤缺被举用后,郤氏家族对晋国霸业也是有巨大贡献的,同时该家族也在晋国霸业的发展中壮大起来。兹列表予以说明,见表1。

表1 郤氏家族对晋国霸业的贡献

人物	年代	事件	结果
郤缺	鲁僖公三十三年	对狄人的战争	获白狄子。晋侯“以一命命郤缺为卿,复与之冀”
郤缺	鲁文公十二年	对秦战争	
郤缺	鲁文公十五年	伐蔡	
郤缺	鲁宣公八年	郤缺为执政	
郤克	鲁宣公十二年	郟之战	大败,郤克不为主帅
郤克	鲁宣公十七年	郤克为执政	
郤克	鲁成公二年	鞍之战	败齐,郤克为中军主帅
郤克	鲁成公三年	伐晋咎如	大胜
郤至	鲁成公十六年	鄆陵之战	大胜

五十余年间,郤氏家族共有两位执政,参加九次对外战争,在晋国的地位蒸蒸日上。鄆陵之战后,郤锜、

①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4册,中华书局2016年第4版,第1199页。

②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1册,第220页。

③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08、550页。

④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3册,第781页。

⑤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3册,第994页。

郤犨、郤至各立一族，皆为晋卿，郤氏家族在诸卿中势力最大。郤氏家族的壮大，自然与其对晋国所建立的功勋密不可分。但是，《左传》在对这一家族作记述时，显然淡化对其功勋的描写，并不侧重于探讨其家族发展壮大原因，而是从多个方面揭示其家族之亡征。这一叙述是从鲁宣公十七年开始的。此年，郤献子因使齐蒙羞而怒，意欲武力报复齐国。《左传》认为，如此恣意妄为，是灭亡之端绪，并以时人评论为证：

（宣公十七年）范武子将老，召文子曰：“燮乎！吾闻之，喜怒以类者鲜，易者实多。《诗》曰：‘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乱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乱于齐乎。不然，余惧其益之也……”^①

此后，《左传》又记载了关于郤氏将灭的数次预言：

成公十三年春，晋侯使郤锜来乞师，将事不敬。孟献子曰：“郤氏其亡乎！礼，身之干也；敬，身之基也。郤子无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师，将社稷是卫，而惰，弃君命也，不亡，何为？”^②

（成公十五年）晋三郤害伯宗，谮而杀之，及栾弗忌。伯州犁奔楚。韩献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纪也，而骤绝之，不亡，何待？”^③

（成公十六年）晋侯使郤至献楚捷于周，与单襄公语，骤称其伐。单子语诸大夫曰：“温季其亡乎！位于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乱之本也。多怨而阶乱，何以在位？”^④

在这三次预言中，时人分析郤氏灭亡的原因有三点：一是不能贯彻“礼”与“敬”；二是虐杀“善人”；三是多怨而阶乱，即没有把握好自己在国内地位。

《左传》对郤氏家族灭亡原因的几种解释，除了“礼”以外，还涉及到个人道德等问题，我们可以将这些原因概括为“理”。这里所说的“理”，就是人类社会秩序得以存在延续的基本规则。《左传》认为，正是因为郤氏之所作所为不合“理”，才导致了最终的灭亡。郤氏家族不合“理”的诸多劣迹，是否构成其灭亡的充分条件？从春秋时代诸多事实来看，这一因果关系并非绝对的。如宋国华督杀孔父、弑殇公，亦是违礼、虐杀善人之举，但华氏代代相传，终春秋一世皆为宋之大族；而一心为公的宋国世卿孔父，其后嗣却流亡他国。这一事实，恰好与作者对郤氏家族灭亡的解释完全相悖。

因此，从事实来看，如何对待礼、善人等因素，与家族成败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世卿个人做出一些违背“理”的事来，或者说，世卿个人做出违“理”之事，只要限定在一定的程度内，并不一定导致家族的灭亡。在一些偶发事件中，世卿违“理”与否，并不构成一个世卿家族灭亡的充分条件，但《左传》在解释郤氏家族灭亡时，的确是有意在二者之间建立一种必然联系。美国学者 Ronald C. Egan 在分析《左传》的叙事时就说：“像所有优秀的历史著作一样，《左传》除了记录一系列事件之外，还揭示了事件之间的联系。虽然《左传》在叙事方面还确实存在着许多局限性，但它一直在向读者揭示特定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⑤

导致郤氏灭亡的直接原因，是晋国内部的君臣矛盾以及新旧贵族势力之间的斗争。这是分封制在诸侯国内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而郤氏的灭亡只是这种历史必然性中的偶然现象。因此，可以说，预言中所体现出的郤氏家族灭亡的“信息因果链条”^⑥，乃是作者在叙述之前即已预设的历史解释。这一结论，在《左传》中还可以找到类似的证据。例如，对于秦穆公不复东征的原因的解释，《左传》归之于子车氏三兄弟被殉葬，这与郤氏虐杀善人而致灭族的因果关系在逻辑的构建上是一致的。

由此可见，《左传》在完成这一历史叙述时，反复记载郤氏灭亡的预言，反映了作者在叙述中努力表达自己的历史解释，意欲将历史进程中的偶然性解释为必然，而时人的预言恰好给作者提供了这样的例证。这正如柯林伍德所说的那样，历史学家在记述过往的历史事件时，并不能观察到事件发生的场景，而只能借助于

①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3册，第846页。

②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3册，第939—940页。

③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3册，第958页。

④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3册，第979—980页。

⑤ Ronald C. Egan, "Narratives in Tso Chua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37, no.2 (December 1977): 324.

⑥ 所谓“信息因果链条”，指的是“把证据和猜想的事件联系起来，或者把后来文本的共同原因和联结节点得以发现的证据联系起来”。参见：塔克尔(Tucker)《我们关于过去的知识：史学哲学》，徐陶、于晓凤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2页。

“另外某种为我们的观察所及的事物来论证它们,而这某种事物,历史学家就称之为他所感兴趣的那些事件的‘证据’”^①。《左传》正是利用了郤氏家族的相关证据来证明其预设历史解释的正确性,同时回避了对那些与其预设历史解释相抵牾的证据的解释。比如,《左传》并不解释郤氏家族是如何壮大的,也并不解释宋国华氏家族为什么没有灭亡。

综上,对于《左传》的历史书写与历史解释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其一,作者对于某些历史事件作出的解释,并不是基于对史事的归纳而得出的,而是源自作者自身本来的价值判断,而这样的价值判断在作者准备历史书写之前即已存在;其二,作者在历史书写时,将自己的价值判断作为预设的目标来开展对史料的编纂,是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个人的主观意识,其历史解释的形成必求有事实为依据,体现了史家的职业素养;其三,作者以叙述客观事实(虽然这个“客观”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但作者不会因个人的主观意志而篡改)的方法,来探究世卿存亡的原因,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对世卿阶层相关史料的详略处理,向读者传递其价值观,表达历史认识,形成历史解释。

二 《公羊传》:对《春秋》模糊叙述的历史解释

与《左传》相比,《公羊传》对世卿的历史书写较少,并且其历史解释的方式也并不依托史料,而是以解经方式形成的。从以下两个方面,可以看出其历史解释的特点。

(一)对《春秋》经“尹氏”“崔氏”的解释

《春秋》隐公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公羊传》曰:“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称尹氏何?贬。曷为贬?讥世卿。世卿,非礼也。”^②

《春秋》宣公十年,“夏四月……己巳……齐崔氏出奔卫。”《公羊传》曰:“崔氏者何?齐大夫也。其称崔氏何?贬。曷为贬?讥世卿。世卿,非礼也。”^③

《公羊传》对“世卿”这一概念的理解,不可能脱离《左传》或者各国史书所提供的史料而臆想。但在历史解释上,则与《左传》作者迥然不同,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将“世卿”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而不讨论这一阶层中各个个体的差异性;第二,所谓“《春秋》讥世卿”的解释,并不是依据客观事实进行推理,而是脱离了史料构建成的“信息因果链条”,也就是说,“讥世卿”是《公羊传》作者的思想,而非《春秋》的思想。《春秋》的历史书写,不过是《公羊传》作者为阐发个人观点而任意选择的一个依托,而非切实可靠的凭证。

以上认识的不合理处在于,春秋时期的世卿人物,既有华督、庆父这类弑君作乱者,又有子产、叔向这些国之贤良,许多世卿人物并不能简单地从道德上定义为“君子”或“小人”。因此,用绝对的“善”或“恶”、“讥”或“褒”给这一阶层作出总体评价,都是不合常理的。但《公羊传》何以得出《春秋》“讥世卿”以及“世卿,非礼也”的结论呢?何休的注释作了说明:“礼,公卿、大夫、士,皆选贤而用之。卿、大夫任重职大,不当世。为其秉政久,恩德广大,小人居之,必夺君之威权。故尹氏世,立王子朝。齐崔氏世,弑其君光。”^④结合《公羊传》的全部书写来看,何休的注解无疑道出了《公羊传》作者真实的创作意图。

作者认为,世卿是春秋时代政治分裂的根源,正是由于卿大夫世袭破坏了政治的统一,削弱了君主的权威,因此对贵族世袭制提出了批判。并且,作者将“世卿,非礼也”这一认识作为解经的原则,这同样是一种预设的历史解释。作者阐明这一历史解释的方法,是利用了《春秋》叙述的模糊性,将认识主体的个人意志强加到对经文的解读中,从而制造了一种看似能够证明自己所预设的那个历史解释的一组证据链。因此,所谓“讥世卿”与“世卿,非礼”,都是《公羊传》的历史观,而非《春秋》的历史观。

当然,《公羊传》及其注家“讥世卿”历史观的形成,从形式上看并不是无根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在对《左传》中弑君者“崔氏”这类世卿的同类事实归纳中得出的,似乎是合理的。但是,这种归纳是有选择性的、片面的,忽略了世卿阶层中在政治上有积极作为的那一群人,其意图是阐明具有时代特征的君臣大义,也就是《公羊传》作者所预设的那个历史解释。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春秋》的作者,在作“尹氏卒”、“齐崔氏出奔卫”这

① 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增补版)》,何兆武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49页。

② 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204页。

③ 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283页。

④ 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204页。

样的叙述时,并不认为这是模糊的。至少,我们不能确定《春秋》的作者是否有意要作这样模糊的叙述,从而制造微言大义。而《公羊传》作者在作解释时,则是有意从《春秋》的这一历史叙述方式中提炼出一种价值判断并加以肯定。如果参照《公羊传》作者对“氏”的另外解释,则更可以印证这一推论。

《春秋》隐公二年,“无骇帅师入极。”《公羊传》曰:“无骇者何?展无骇也。何以不氏?贬。曷为贬?疾始灭也。”^①

前引《公羊传·隐公三年》之说,曰:“其称尹氏何?贬。”而此处又说:“何以不氏?贬。”则《春秋》对于世卿,称“氏”亦贬,不称“氏”亦贬,这在逻辑上就自相矛盾了。这不是《春秋》经自身的矛盾,而是《公羊传》作者在利用《春秋》作为证据时而产生的矛盾。因此,《春秋》称“氏”与否,对于《公羊传》作出历史解释并无任何影响。无论《春秋》用怎样的措辞,《公羊传》都可以通过将《春秋》历史叙述模糊化,来完成自己最初预设的历史解释。作者在构建证据的因果信息链时,并不是要复原《春秋》经的本义,而只是借助《春秋》来完成对自己预设的历史解释的论证。

正如朱熹所质问的那样:“人道《春秋》难晓,据某理会来,无难晓处。只是据他有这个事在,据他载得恁地。但是看今年有甚么事,明年有甚么事……只是恁地。而今却要去一字半字上理会褒贬,却要去求圣人之意,你如何知得他肚里事!”^②

(二)关于“大夫之义不得世”的解释

《公羊传》认为世袭是当讥贬的,在其另外一段的历史解释中也体现出这一思想,这就是“大夫之义不得世”。鲁昭公三十一年,邾娄国大夫黑弓带着封邑濫(邑名)叛逃至鲁国。

《春秋》昭公三十一年,“冬,黑弓以濫来奔。”《公羊传》曰:“文何以无邾娄?通濫也。曷为通濫?贤者子孙,宜有地也。贤者孰谓?谓叔术也。何贤乎叔术?让国也。……通濫则文何以无邾娄?天下未有濫也。天下未有濫,则其言以濫来奔何?叔术者,贤大夫也。绝之则为叔术。不欲绝,不绝,则世大夫也。大夫之义不得世,故于是推而通之也。”何休注曰:“叔术者,贤大夫也。如不口系邾娄,文言‘濫黑弓来奔’,则为叔术贤心,不欲自绝于国。……如口不绝邾娄,文言‘濫黑弓来奔’,则嫌氏邑,起本邾娄世大夫。”^③

黑弓为邾娄贤大夫叔术之后裔,其家族存在事实上的世袭。但至于何休何以由“黑弓以濫来奔”看出《春秋》有“大夫之义不得世”之意,传、注文颇难读通。近有学者解云:“何氏之意,经书‘黑弓以濫来奔’,传家读作‘邾娄黑弓以濫来奔’,文无‘邾娄’二字,口读却有之。何以如此?案《春秋》新通濫为国。不得直言‘濫黑弓来奔’,若直言‘濫黑弓来奔’,则濫之为国,与邾娄相绝,此非叔术本意,叔术贤,其本意不欲自绝于国也。若言‘濫黑弓来奔’,且口系于邾娄,读作‘邾娄濫黑弓来奔’,则濫是邾娄之邑,‘濫黑弓’乃以邑为氏,如齐崔杼例,然大夫以邑为氏,又有世大夫之嫌,此亦非叔术之意。是知文言‘濫黑弓来奔’,不论口系邾娄以否,皆不得叔术本意,注云‘文不可施’,谓此也。”^④也就是说,《春秋》将邾娄国的濫邑视为独立一国,因此不书“邾娄黑弓以濫来奔”,传《春秋》的经师为了让学生明白经义,在诵读时加上“邾娄”二字。既然将濫视为一国,为何不直说“濫黑弓来奔”呢?是因为如果加上“濫”字,要么意味着与邾娄国断绝关系,要么意味着大夫以邑为氏,世袭封地,这是不符合“大夫之义”的,因为大夫之义不得世袭。因此,如果说“濫黑弓来奔”,就“文不可施”了。结合《公羊传》上下文,这一解释最为恰当。

“黑弓以濫来奔”,本是寻常的历史叙述语句。《公羊传》同样是通过“濫”的模糊化解读,使这一叙述成为“大夫之义不得世”的证据。事实上,春秋时代之卿大夫,无论是政治伦理上,还是思想观念上,其封邑皆可世袭。而《公羊传》对《春秋》历史叙述的解释,是有违春秋时代历史事实的。赵光贤就曾指出:“(世卿)世袭地享有卿的政治地位,执掌政权。本来封建政治是封建贵族的专政,当然他们的卿士地位是会世袭下去的,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可是《公羊传》却提出《春秋》‘讥世卿’的说法,说:‘世卿,非礼也’。他不懂得世卿正

①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202页。

②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6册,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144页。

③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331—2332页。

④郜积意《徐彦〈公羊疏〉补正》,《中国典籍与文化》2018年第2期,第72页。

是周礼的根本。”^①但《公羊传》的解释对后世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如《谷梁传》隐公三年：“尹氏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范宁《集解》曰：“尹氏时在职而诏鲁人之吊者，不书官名，疑其讥世卿。”^②

宋代孙复作《春秋尊王发微》，则将“讥世卿”发挥到极致。《春秋》隐公元年：“公子益师卒。”《公羊传》解释为：“何以不日？远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③《谷梁传》解释为：“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恶也。”^④《左传》解释为：“众父(益师)卒，公不与小敛，故不书日。”^⑤三传都是从日期上去解释《春秋》这句话，但孙复的解释却与三传全不同：“益师，孝公子，内大夫也。内大夫生死皆曰公子、公孙与氏，不以大夫目之者，恶世禄也。古者诸侯之大夫皆命于天子，周室既微，其制遂废。故鲁之臧氏、仲孙氏、叔孙氏、季孙氏……皆世执其政，莫有命于天子者。此可谓世禄者矣。”^⑥孙复舍传求经，同样是通过《春秋》历史叙述的模糊化解释，得出所谓“恶世禄”，实属“讥世卿”之旧调新词，只是为了合其尊王之意，在思想和方法上是与《公羊传》一脉相承的。

以上观点，显然是受到《公羊传》的影响，其用意在于强调君臣关系的绝对性。《公羊传》的历史解释，舍《左传》而祖《春秋》，通过对《春秋》叙述的模糊化解释，来为其“讥世卿”的历史观寻找证据链，其影响不仅及于经学，而且波及后世的历史书写。

三 作为乱臣贼子的世卿：一种割裂整体叙述的历史解释

秦汉以后，由于中央集权体制的巩固，多层级的君臣关系变成了单一的君臣关系，因此君臣大义成了思想家永恒的主题。为了凸显君臣之义，学者有关世卿阶层的书写与解释，往往又舍《左传》而宗《公羊》。

汉代公羊学的兴盛，使“大一统”思想达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而“讥世卿”一说正是与“大一统”相呼应的。故汉代学者特别强调君臣之分，贬斥春秋世卿对君权的削弱。董仲舒说：“观乎世卿，知移权之败。”^⑦司马迁作《史记》，最受董仲舒影响，故曰：“《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⑧太史公之论，亦并不从历史的进步性看待世卿，其公羊学色彩是很明显的，并成为汉代的主流认识。张敞治《春秋》认为：“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讥世卿最甚。”^⑨魏相又说：“《春秋》讥世卿，恶宋三世为大夫，及鲁季孙之专权，皆危乱国家。”^⑩汉人所持议论，其论据源于《左传》，而论点则有悖于《左传》，同于《公羊传》。且看《左传》两段文字，以见作者对世卿的态度。

(文公七年)(宋)昭公将去群公子，乐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叶也；若去之，则本根无所庇荫矣。葛藟犹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为比，况国君乎？此谚所谓‘庇焉而纵寻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图之！亲之以德，皆股肱也，谁敢携贰？若之何去之？”^⑪

(襄公五年)季文子卒。大夫入敛(殓)，公在位。宰庀家器为葬备，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无藏金玉，无重器备，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⑫

从以上《左传》作者所引和所叙述的文字来看，他并不因世卿专政而否定其在历史上的积极意义。宋国群公子之为大夫，鲁国季氏之为宰辅，始终是维持君主统治的重要倚靠力量，是维持国内政治稳定的重要因

① 赵光贤《周代社会辨析》，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1页。

② 范宁集解、杨士勋疏《春秋谷梁传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368页。

③ 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200页。

④ 范宁集解、杨士勋疏《春秋谷梁传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366页。

⑤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1册，第20页。

⑥ 孙复《春秋尊王发微》，段志强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117页。

⑦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钟哲点校，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31页。

⑧ 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2版，第3297—3298页。

⑨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217页。

⑩ 班固《汉书》，第3134—3135页。

⑪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2册，第608—609页。

⑫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4册，第1036页。

素,是春秋社会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一旦国内世卿共政的局面遭到破坏,必将带来更大的内乱。这一点是得到《左传》作者肯定的。

然自汉以后历代学者无论对三传持怎样态度,在“讥世卿”的认识上始终承袭《公羊传》的观点。有清一代则是对公羊学历史观的总结阶段。清代学者对于世卿的批判与其《春秋》学研究相始终,无论是史书编写,还是经学论战,世卿总是各家矛头所指。例如对于鲁国世卿季孙氏,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说:“故鲁之削,成于三桓,而季为之魁,宿(季武子)及意如(季平子)不容诛。”^①朱骏声《春秋乱贼考》则将季氏归为“乱贼”^②。但《左传》昭公二十七年却是这样评价鲁国季氏的:“鲁君守齐,三年而无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与之,有十年之备,有齐、楚之援,有天之赞,有民之助,有坚守之心,有列国之权,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国。”^③可见,清人的这些说法与《左传》所记载的春秋时代观念大相径庭。

自汉至清的经、史学者,无不从《左传》中认识历史上的世卿,但受“讥世卿”一说影响,产生了两种不同于《左传》的认识。

其一,对春秋时期君臣关系的非历史主义解读。与秦汉以后中央集权制下单一的君臣关系不同,春秋时期的君臣关系是多层次的,不同层级的封君与封臣构成不同层级的君臣关系。天子与诸侯、诸侯与世卿、世卿与家臣皆可称君臣。如果说世卿对于诸侯为乱臣贼子,那么诸侯之于天子,家臣之于世卿,又何尝不是呢?且从“尊王”之义出发,世卿对国君的绝对忠诚,恰恰是对天子的一种分权,公羊家仅就诸侯与世卿这一组君臣关系来讨论“讥世卿”的历史价值,显然是片面的。且世卿叛诸侯,恰恰削弱了诸侯对天子的分权,客观上是有利于周王室的。因此,就“讥世卿”这一观点论证的整体过程来看,反而是与其“尊王”之义相背离的。在君臣关系中,周礼也并不只强调臣的义务与责任,而是君臣对等地履行职责和义务,这也是周人的观念。《左传》隐公六年:“郑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礼焉。周桓公言于王曰:‘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善郑以劝来者,犹惧不蔭,况不礼焉?郑不来矣!’”^④故《论语》云:“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⑤《左传》作者是能够以历史的态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故《左传》宣公四年有“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⑥的评述,而“讥世卿”一说不仅脱离了《左传》的叙述,更违背了客观历史事实。

其二,片面强调世卿阶层在历史上的消极意义。公羊家论证“讥世卿”一说,仅从《左传》的历史书写中抽取世卿独立分权、擅行废立的事件作归纳,以证世卿之“世”对政治的分裂。这样的经学历史观蔓延到史学领域,其影响不可谓小。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即说,国家大患,莫乎世卿,“世卿之祸小者,淫侈越法,陨世丧宗。或族大宠多,权逼主上,甚者厚施窃国,陈氏篡齐,三家分晋。故世卿之祸,几与封建等。”^⑦但对于郑国子产、宋国向戌等世卿人物,在政治改革、弭兵等方面的积极意义则是有选择地回避了。实际上,在重视血缘关系、推崇亲亲以相及的周代社会,作为各个家族领袖、受过良好教育的世卿,不仅是维护周代社会政治秩序的中坚力量,而且也是社会进步的推动力量。齐国田氏、鲁国季氏、晋国三卿之统治策略较旧式君主更有历史的进步意义,这是作为记录世卿最早且最完备的史料《左传》所呈现的客观史事;但在“讥世卿”经学历史观的支配下,汉代以后学者对世卿均以乱臣贼子视之,这是在《左传》的整体叙述中抽取部分构成历史解释的证据,与《左传》的历史叙述并不是在同一个维度上的对话与阐释。

四 结语

春秋战国之际,由分封制走向中央集权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政治变动,乃是由分封制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各个阶层在社会剧变中所担当的角色皆是历史的选择,世卿作为政治变革的中坚力量,在打破旧制度的过程中被记录最多。

①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第1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14页。

②朱骏声《春秋乱贼考》,《续修四库全书》第1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25页。

③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5册,第1654页。

④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1册,第55—56页。

⑤刘宝楠《论语正义》,高流水点校,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16页。

⑥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3册,第741页。

⑦顾栋高辑《春秋大事表》,吴树平、李解民点校,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203页。

《左传》、《公羊传》作者以及秦汉以后的儒者,都是在预设的一种历史解释下对世卿阶层展开叙述,并且都按照各自预设的历史解释编排史料,形成证据,只是在如何建立证据链的问题上存在差异。《左传》作者并非将世卿阶层作为一个整体来评价,而是在具体的历史事件中认识每一个人物,是从历史事件的特殊性中来阐释自己的历史认识。从形式上看,《左传》作者的历史解释是完全遵循客观事实的。但关于世卿在文献中所呈现出的史料,也是由《左传》作者来完成书写的。当历史书写与历史解释由同一认识主体完成时,叙述的客观性必然也会受到认识主体所预设的历史解释的影响。因此,在史料的编纂上,作者朝着自己所预设的历史解释方向进行详略书写的主观性是很明显的。《公羊传》与汉代以后的学者对于世卿阶层的认识,不可能脱离《左传》所提供的史料而凭空想象,但在历史解释时又都脱离了《左传》的叙述而另立新论,即“《春秋》讥世卿”和“世卿非礼”。新认识的论据,《公羊传》是通过《春秋》叙述的模糊化解释来完成的,而汉以后的学者则是通过从《左传》的整体叙述中抽取部分(主要是世卿违礼、弑君、道德败坏等方面的例子)来完成的。

由此可以看出,在《左传》和《公羊传》历史解释的形成过程中,认识主体的个人意识才是历史解释的原点。文献记载乃至最客观的历史事实,只有在认识主体完成预设历史解释的过程中,才被按照一定方式编纂,成为证据。不过,史学的解释是史家意识与客观事实之间的张力呈现,是在历史书写的叙述中完成的,出于职业规范,其主观性的发挥不得不受到事实客观性的制约。而经学的历史解释主观色彩更浓,其指向论点的各种论据,不过只是在史学作品中片面地摘录部分例证来构建在逻辑上看似成立、实际上完全不顾史料原貌的一组证据链而已。然而,经学的历史解释方法,可以给后来者提供更广阔的发挥空间。并且,“讥世卿”的历史观更能契合后世大一统时代的政治需要,因而更容易被接受且产生深远影响。因此,《左传》与《公羊传》对世卿阶层的历史书写与解释,为理解中国古代经学与史学在认识论形成路径上的差异提供了一个视角。

[责任编辑:凌兴珍]